《外國語文研究》第三十六期
2022 年 12 月 頁 115-122
DOI:10.30404/FLS.202212_(36).0005

【書評】
歷史？小說？評海澤爾頓的《先知之後》伊斯蘭口傳歷史的「歷史性」

萊思麗·海澤爾頓：《先知之後：伊斯蘭千年大分裂的起源》，夏莫譯，台北，八旗文化，2017 年

王經仁*

國立政治大學

摘要

海澤爾頓的《先知之後》探討伊斯蘭早期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分裂因果。她以著名的九世紀伊斯蘭史學家塔巴里的史料為本來書寫。因為廣泛運用伊斯蘭口傳歷史的記錄以及她近似小說體的書寫風格，造成許多讀者批評這本書的學術不夠嚴謹、是小說而不是歷史。

* 國立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副教授

【Book Review】

History? Fiction? On Hazleton's *After the Prophet*: How "Historical" is Islamic Oral History?

Hazleton, Lesley. *After the Prophet the Epic Story of the Shia-Sunni Split in Islam.* Anchor Books, 2009.

Ching-Jen Wa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Hazelton's *After the Prophet* explores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the Shia-Sunni split in early Islam. Her writing is based largely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al-Tabari, a renowned ninth-century Islamic historian. Due to the extensive use of historical accounts from Islamic oral history and her approximate novel style, many readers have criticized the book as being less rigorous in scholarship and as more fiction than histor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rabic Language and Cul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先知之後伊斯蘭千年大分裂的起源》(以下稱《先知之後》)，2017 年八旗文化出版，譯自萊思麗．海澤爾頓（Lesley Hazleton）2009 年出版的 *After the Prophet The Epic Story of the Shia-Sunni Split in Islam*。如書名所說，這是一本探討伊斯蘭早期的歷史，從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後的繼承人紛爭開始，最後導致伊斯蘭分裂成水火不容的遜尼派和什葉派，一直到今日。中文版在台灣似乎沒有引起太多的討論，英文版在美國則引起較廣泛的注意，尤其是在亞馬遜網站上可以看到許多讀者留言的激烈爭論，批評這本書學術不夠嚴謹、是小說而不是歷史。

本書作者海澤爾頓是一位英裔的美國記者和作家，曾在大學任教，1966 年到 1979 年為紐約時報的記者，駐點於耶路撒冷。寫作生涯中曾為多個著名的報章雜誌撰寫專欄，如時代雜誌、華盛頓郵報等。她的一系列的著作，主要專注在中東地區的宗教、歷史和政治上。可預期地，她的書寫觸碰了許多敏感的議題。她在推特上為自己做的註解：「一位未知論者眼中的宗教、政治和存在」(an agnostic eye on religion, politics and existence)。

譯者夏莫（賴芊曄），譯筆相當忠實而且流暢，專有名詞的翻譯也考慮讀者的習慣，大致按照一般的習慣用法。有伊斯蘭背景的中文讀者讀起來不會覺得突兀。原著英文版有三個部分以三個人物命名：穆罕默德（Muhammad）、阿里（Ali）和胡笙（Hussein）。

譯本與原著的內容和編排大致相同，但也有些許差異。以下做簡單的討論。全書共 15 個章節，原書並沒有標題，譯本為每一章加入了標題：例如第一章「先知之死：種下分裂的種子」; 第二章「項鍊事件：百口莫辯的先知愛妃」等。這些都是原著英文版沒有的。標題確實有摘要的作用，歸納這一章的主要內容，當然主要的考量可能是吸引中文讀者的注意力。畢竟伊斯蘭的歷史對大多數中文讀者來說不是熟悉的領域。

原書的註釋（Notes）放在全文 15 章之後，八旗將註釋移到每一章的章末，並且有時加入了原著中沒有的譯註。譯本末的「參考資料」，在原著中是 Sources（資料來源），而不是 Bibliography（參考書目），顯示原著並非採用學術著作的寫作方式。在「書中主要氏族與親屬關係圖」（Main Clan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in *After the Prophet*）後，譯本當中加入了原著沒有的「重要人物介紹」，其中包含先知穆罕默德及愛妻哈蒂嘉等 10 位書中主要人物。譯本還加入了「編輯的話」和「導讀」。譯本沒有原著的 Index（索引），而有「中英文對照表」。譯本中的增刪除或是修改，顯然是為了讓中文讀者在閱讀上能夠更容易進入狀況。

觀察許多讀者的評論（尤其是英文版），爭議大多來自：1）宗教立場不同，遜尼派和什葉派本來就有不同的史觀，因此不同意海澤爾頓的觀點；2）這本著作是「歷史」還是「小說」的質疑。關於第一點，海澤爾頓無法說服遜尼派或是什葉派的任何一方，因為穆斯林在成長的過程中不斷接受自己派別的教長的教導，很難接受新的見解，尤其還是來自一位非穆斯林西方人的觀點。同時許多人對於海澤爾頓「過於人性」地描繪阿伊

夏的強悍性格或是阿里的委曲求和的懦弱也無法認同。而第二點，是歷史還是小說的爭議則來自作者海澤爾頓的敘事風格以及史料運用方式。《先知之後》不是以學術形式的方式來書寫，因此許多歷史事件的發生並沒有清楚交代出處。尤其是她使用近乎小說「全知敘事者」(omniscient narrator) 的寫法，宛如當時她就在事件現場，可以同時身處各處，又同時了解七世紀當事者的內心想法，這讓許多讀者們覺得事件的描述是想像、虛構的。

關於第一點宗教立場的問題，無論誰來書寫，遜尼或是什葉兩方都很難改變既定的立場，不是紙上討論分析就能達成協議，所以在此不做討論。但是歷史還是小說的爭議則是可以經由分析讓讀者更了解如何閱讀以及理解這本書。所以在此必須特別討論海澤爾頓的書寫風格以及史料的來源。

海澤爾頓相信她的書寫風格是在重現伊斯蘭的歷史記憶。她在第二章就特別解釋了阿拉伯歷史的書寫傳統，可是許多讀者並不了解她的用意。她強調，歷史本來就是故事，書中的許多故事，如「項鍊事件」(the Affair of the Necklace)、「斗篷下的人」(the People of the Cloak)、「駱駝之戰」(the Battle of the Camel)、「密函」(the Secret Letter) 等，是流傳民間許久的故事，構成了早期伊斯蘭的歷史主軸，這是口述歷史的特色，「具體反映出在印刷工業和大眾識字年代之前的歷史如何展開」。(《先知之後 》，52) 她還說：「在伊斯蘭教的首個一百年，這些故事們並未書之於史冊，而是流轉在說書人的舌尖上，再由聽眾銘記在耳中和心間，細節隨著時光流逝不斷積累。這是早期伊斯蘭教史家的原料，他們的考察穿越各地，翻山越嶺以蒐羅這些記憶。他們仔細聆地聽每一段極為詳細的敘述，並小心翼翼地記錄『傳述鏈』(the chain of communication) 上的每一個來源。他們稱之為 *isnad*—即每段記憶的起源。」(《先知之後》，52-53) 熟悉伊斯蘭文化的人也應該知道，所謂的 *isnad*，不只是許多史學家的史料來源，也是穆斯林的重要經典《聖訓》內容來源的主要依據。這種口述的傳述鏈相當重要，尤其是在伊斯蘭剛出現之後，隨著古蘭經的編撰，阿拉伯文字書寫才開始發展並且標準化，多數人都沒有文字的能力，自然得依靠口耳相傳來維持訊息的延續。全書 15 章，而海澤爾頓在第二章就很清楚地指出她的意圖：這些故事原來就存在，她要用最接近傳統的口述形式來重現歷史。

海澤爾頓雖然沒有使用學術的格式來書寫這段具有爭議性的歷史事件，但是她很明白地指出她的「故事」是有歷史根據的。除了當代學者的著作外，她更仰賴伊斯蘭學者的研究。她在書末的參考資料中說：「除非我有特別註明，塔巴里都是這本書所有直接引用和對話的出處。」(《先知之後》，311) 她所說的史書是塔巴里 (Abū Jaʿfar Muḥammad ibn Jarīr ibn Yazīd al-Ṭabarī 839-923) 的《使者和國王的歷史》(تاريخ الرسل والملوك，The History of al-Ṭabarī)。她之後也更明確地告訴讀者：「我特別大量使用以下幾卷：7、8、9、15、16、17、18、19。」(《先知之後》，314-5)

塔巴里的《先知和國王的歷史》在伊斯蘭世界享有權威的地位，是許多研究早期伊斯蘭歷史的學者專家的重要依據。阿文版以穆罕默德．易卜拉欣（Muḥammad Abū al-Faḍl Ibrāhīm）的版本最受推崇，共 11 冊。英文翻譯版含索引共 40 冊，是海澤爾頓使用的版本。這是一套編年史，記載從創世紀開始到西元 915 的阿巴斯王朝（Abbasid Dynasty）為止。書中的事件，大多是以說故事的方式記載。單一事件可能也有不同版本的消息來源。海澤爾頓仔細研究這份史料並指出：「他（塔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訪問相同的事件，到了幾乎狂熱的地步。因為每個人講述的都是自己心中的版本，不同版本之間往往會有重疊和差異之處……因此他頻繁地用亙古的名言來為每段有爭議的插曲下結論：『那只有真主才知道』」。（《先知之後》，53-54）

塔巴里是遜尼派的史學家，他如何獲得伊斯蘭世界整體的信任和推崇呢？原因不複雜。儘管他在這套書的索引（Dhayl al-mudhayyal）當中曾提出一個相當極端的個人意見：「任何違背他的觀點的人都不是真的穆斯林，同時他不接受 Qadarī, Shīʿī, 或是 Khārijī 派別信徒的傳述證言」（The History of al-Ṭabarī, v39, xix），但事實上，他接納多位非遜尼派的學者的觀點，而且他們的名字也都列入了索引當中，顯示塔巴里將歷史傳承置於派別分歧之上。

海澤爾頓在運用塔巴里史料的同時，確實也時常加入一些她個人的敘事法，造成一些讀者在閱讀認知上的的困擾。我們可以對照塔巴里的史料和中文譯本來窺見海澤爾頓故事轉化的風格。英譯版第九冊中寫著：

> The Messenger of God asked for ʿAlī, but Ā'isha said "[I wish] you had asked for Abū Bakr! "Ḥafṣah said, "[I wish] you had asked for ʿUmar!" So all of them gathered before the Messenger of God. He asked them to disperse, for he would call them if there should be any need, and they went away.（The History of al-Ṭabarī, v9, 179）

而到了海澤爾頓的筆下：

> 當他叫喚阿里之時，阿里這段時日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清真寺裡學習和禮拜，但阿伊夏轉而遊說其改見她的父親。「難道你不是更想見阿布—巴克爾？」她說。另一位妻子哈芙莎則轉而試圖暗示穆罕默德該見見他的父親。「難道你不是更想見伍瑪爾？」她問。不堪承受他們的堅持，穆罕默德只得揮手同意。於是阿布—巴克爾和伍瑪爾都得以被召見，唯獨阿里沒有。(《先知之後》88）

除非海澤爾頓還參考了其他的史料來源，否則，她確實加入了一些個人的文字想像，但主要都用在當時的氛圍營造，而事件本身上大致上是忠實的。如果讀者願意做比對，這種例子相當多。

「閱讀這些七世紀的聲音，你會覺得自己如同置身於廣袤沙漠上，絲絲入扣的故事超越了時空的限制，讓人感覺身歷其境。」(《先知之後》，54）海澤爾頓提醒讀者們「故事」的感染力。她以塔巴里的史料，用古人說故事的方式延續文字和印刷出現前的口述歷史傳統，嘗試再造共同的記憶；她相信口傳歷史具有書寫歷史的真實性。如果用學術的標準來評論這本書，它顯然不符合學術規範。然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絕對是一本有所依據的著作。在了解本書的書寫過程後，是歷史還是小說，應該是無需爭辯的。也許在不同地區環境成長的穆斯林有不同的看法，但無疑地，這本書提供寶貴的而且人性的史觀。

參考文獻

萊思麗・海澤爾頓：《先知之後：伊斯蘭千年大分裂的起源》，夏莫譯，台北，八旗文化，2017 年

Abū Jaʿfar Muḥammad ibn Jarīr ibn Yazīd al-Ṭabarī. *The History of al-Tabari.* Vol. 1-40.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1999.

Hazleton, Lesley. *After the Prophet: the Epic Story of the Shia-Sunni Split*. Anchor Books, 2009.

Address for correspondence

Ching-Jen Wang
Department of Arabic Language and Cul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o.64, Sec. 2, ZhiNan Rd.
Wenshan Dist.
11605 Taipei City
Taiwan

wangcj@nccu.edu.tw

Submitted Date: September 18, 2022
Accepted Date: November 2, 2022